

呂梁黨史資料



中共呂梁地委黨史研究室編

•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

吕梁党史资料

第 八 辑

中共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编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目 次

晋西北贸易工作和土地改革	牛荫冠 (1)
刘少白奉党之命办银行	牛何之 (15)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访问延安	牛旭光 (29)
孝义县牺盟会工作片断	樊思斋 (43)
抗战时期晋西北妇女运动概况	姜宝箴 (59)
回忆晋西北妇女工作	赵 辉 (81)
晋西北三分区的纺织运动	梁 山 (100)
抗日战争时期孝义县的妇女工作	冯 涛 马俊之 滕 锐 (104)
“一二·九”运动在兴县中学	裴亚东 (117)
宣传抗日开仓济贫 ——东征红军在交城目击记	张进才 (121)
红军东征在石楼侧记	刘 展 (125)
热血洒吕梁 英名永流芳 ——缅怀刘德明烈士	交城党史办 (129)
山西保安游击第一支队的组建及其在文水的活动	文水党史办 (132)

晋西北贸易工作和土地改革

牛荫冠

(一)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晋西事变”爆发后，我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离开秋林，一九四〇年一月初来到晋西北，在临县找到罗贵波同志，同时与滕代远同志联系上，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听滕代远同志指挥。紧接着晋西南区党委的党政领导同志与决死二纵队也胜利转移到晋西北来了。在临县城召开了一个胜利会师大会，参加的领导人有滕代远、罗贵波、赵林、林枫、韩钧、雷任民、张文昂、牛荫冠、续范亭、黄骅、陈士渠等人。当时我接到北方局杨尚昆同志的电报，大意是说：知道你已安全到达晋西北，甚慰，对刘岱峰要善待之。过了几天，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一二〇师部队也从冀中回来了。在临县城，林枫同志（晋西南区党委书记）要我留在晋西北担任行署副主任。接着，贺龙、关向应在岚县召开了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由关向应、滕代远主持，参加会议的人有贺龙、甘泗淇、林枫、罗贵波、赵林、牛荫冠、韩钧、雷任民等。会议上决定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决定成立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晋西北行署主任由续范亭担任，副主任由牛荫冠担任。并决定晋西北和晋西南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晋西

区党委，由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任书记，晋西北区党委的赵林任副书记。还决定在兴县城召开一次晋西北行政会议，会议由续范亭与牛荫冠主持。出了布告，宣布晋西北行署成立，布告是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发表的。

晋西北行署成立以后，办公地点就在兴县蔡家崖村（这是牛友兰的家，也是阎锡山反动军官赵承绶曾经办公的地方）。此时，蒋介石派第一军李文部队进入西安。我党分析，可能要打一个大仗。蒋阎合伙要洗刷他们“十二月政变”中惨败的耻辱，妄图打击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晋西区党委决定开展“四大动员”工作。行署开始办公以后，关向应与滕代远一起到行署，找牛荫冠谈话，要牛荫冠同志担任行署的党组书记，把行署的全部工作抓起来，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有顾虑。行署的领导干部，大都是从秋林过来的，行署的各处，除武新宇为民政处长，汤平为财政处长外，还有张隽轩（原阎锡山委任的第四行政区专员）为建设处长，刘墉如（原成成中学的校长后来是游击队队长）为教育处长，梁膺庸为教育处副处长，后来杜心源为教育处长，刘少白老先生为西北农民银行的行长，赵方为公安局副局长。至于民兵的领导人，先是慕纯农，后为卫一清，经济局局长为段云，后改为贸易局，汤池为副局长。区党委决定成立晋西北行署党组，党组由武新宇（当时在延安，内定担任晋西北行署的民政处长），汤平（由八路军一二〇师部队调到晋西北行署担任财政处长）与牛荫冠三人组成，牛荫冠为党组书记。有一天，关向应到行署告诉牛荫冠说：党中央已派人跟阎锡山谈判，要和平共处。谈判成以后，我们要杀的人就不好杀了，所以现在应该把可杀的人立即杀掉。这是为了安定

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革命根据地。牛荫冠同志与公安局长赵方同志商量，由赵方把公安局关押的罪犯一个个地加以审查，提出材料与证据，送牛荫冠审批，批准一个，就枪决一个。这样就把当时晋西北极端反动的地主、恶霸分子，杀了十几个。在兴县城召开了胜利大会，大会上枪决了康怀德、刘兆基等三人。这是区党委罗贵波决定的，由牛荫冠签字执行。康怀德是牛荫冠的亲表弟。枪决康之后，在晋西北群众中影响很大，说牛荫冠是大公无私，共产党政策好。后来，中央批准建立晋西北军区，由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这时军区住兴县李家湾。接着由关向应同志在李家湾召开了一个领导干部会议，叫做党内的军政委员会，书记是关向应，委员有贺龙、甘泗淇、林枫、牛荫冠等人。统一领导晋西北的党政军工作。在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牛荫冠曾提议，是否叫武新宇也参加，关向应同志说，算了吧。这个军政委员会刚成立，又成立了党内的财经委员会，也是属党内的组织，由贺龙任主任，汤平（财政处长）任副主任。委员中有牛荫冠，还有其他几个人。这个财经委员会召开过多次会议，陈希云是一〇二师后勤部长，（解放后曾任粮食部长）也参加过这个财经委员会。

这时，日本人“扫荡”晋西北特别残酷，春季夏季与冬季一连“扫荡”了三次。一九四〇年冬天，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把房子烧光了。几次反“扫荡”都由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弟同志指挥。第一次反“扫荡”后，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碰见一个妇女，大哭：“你们抗日，抗的什么日？叫日本人把房子都烧光了”。当时，最大的事情就是帮助老百姓发展农业生产。发动群众支援前线。除解决粮食以外，还要解决穿

衣问题。行署提出要解决十万人（包括晋西北的军队与人民）的穿衣问题，发展了一种标准布，在晋西北出售，很解决问题。后来，在晋西北还有一种特货，是一九四三年王震同志带来毛主席的亲笔信，要晋西北搞这种东西的。特货起的作用很大，可以送到敌占区，换回国民党的黄金；再把黄金拿到太原买回敌占区的棉布，解决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地区军民的穿衣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间，贺龙同志与林枫同志一块到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工作。党中央决定要扩大晋西北根据地。贺龙因担任陕甘宁和晋绥五省联防司令员，留在延安了。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因为关向应有病，让林枫同志代理分局书记。中央还决定在晋绥分局的领导之下，召开晋西北的临时参议会。四二年十月，临参会召开，选举林枫为临参会议长，刘少白、牛荫冠为副议长，选举续范亭为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武新宇为副主任。在这以前，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底，区党委负责同志和我谈过一次话，说到晋西北的党政干部中有来自牺盟会的，也有来自“动委会”的（“动委会”是抗日初期在一九三七年由阎锡山与共产党公开合作组成的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的组织。续范亭为主任，南汉宸为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程子华为武装部长，武新宇动员分配部副部长。一九三九年被阎锡山取消了），也有晋西北的、晋西南的。大家有些意见，有人感到对于“动委会”干部与原晋西北干部提拔重用不够，以后要设法缓和这种情绪。人们认为牺盟会是秋林地区的，属于晋西南管，牛荫冠同志既是晋西南的，又是牺盟会的干部。武新宇同志是山西有名的革命人物，在行署担任民政处长本人是有些意见的。为此林枫

同志专门到行署找武新宇谈话，林枫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都知道我们这里有个大学教授，所以你武新宇应该满足于当前的工作”。接着，区党委于一九四一年间，提拔武新宇担任了行署的秘书长，党内担任党组书记，牛荫冠为党组成员。到临参会召开之时，就正式选武新宇为行政公署的副主任。这样，可以缓和一下“动委会”与晋西北干部的情绪。我到临参会担任副议长，没有多少实际的事可干。后来林枫同志提议要我兼任贸易总局的局长（也兼银行行长），于是，我就集中精力，开辟根据地的贸易工作与金融工作。当时，主要是帮助发展农业生产，继续解决晋西北军民的吃饭和穿衣问题。穿衣问题，既发展土布生产，也到敌占区秘密地购买一些棉花进入根据地。总的贸易方针是物资交流，具体做法是勾通晋西北与各地的物资交流，也吸收敌区的一些棉花之类。当时，调王磊同志当贸易总局的副局长，有一段时间就住在八分区购买棉花。至于特货工作，一九四五年我到延安向陈云同志汇报工作时，陈云同志要晋西北的贸易局狠抓此事，还说这是革命的需要。有了这种东西，就有黄金；有了布匹，就会使根据地军民渡过经济困难。陈云同志于日本投降后到东北之前，还拍电报给我，要我抓紧此事。我也就按照陈云的指示去办理。日本投降之后，中央决定李井泉任晋绥分局的书记，贺龙是中央代表。林枫调到东北，开辟新区工作去了。我到延安给陈云汇报工作后之，在延安由贺龙同志召集了一个小会，讨论晋绥的贸易工作。陈云、贺龙、林枫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我在会上提出几条方针，主要内容是：各机关部队特别是部队都做生意，要把这些经济力量很快组织起来，统一领导。不然的

话，市场很难稳定。公家的经济力量壮大后就可以扶助私人工商业，使整个根据地的经济繁荣起来，有利于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战争，壮大革命力量。贺龙同志也说这是晋绥的长远方针。会议之后，我们从延安回到晋西北，按照陈云的意见，开展贸易工作。根据陈云与晋绥分局的意见组织了一个“兴业公司”，把各部队、机关开设的商店合并起来。并规定这些商店的原单位对商店的人员不许调动，物资不许拿走。这样“兴业公司”的资金就雄厚了。还从部队调廖诗权来当经理（后来在铁道部曾担任副部长），总会计是韩博同志。又在临县城成立了一个大商店叫“恒信昌”，由大商人李馥香（一九三七年抗战初期，曾与另一个大商人冯锡藩给一二〇师解决了过冬的棉衣。贺龙、关向应认为李馥香与冯锡藩有功，要重用这两个大商人），裴明轩领导。这些商店，都在贸易总局领导之下积极开辟工作。同时晋西北的私人工商业也有所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日寇的“扫荡”中，在国民党的封锁之下，晋绥与陕甘宁的经济困难，由于这些经济上的正确政策，军民一致的奋斗，都逐渐地得到解决了。

（二）

一九四五年全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党中央于一九四六年发表了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接着又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一九四七年在解放区进行了改革。这场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除有些具体问题还有争论外，从总的方面说，党中央制定的土改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晋绥党在具体执行中没有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办事，犯了“左”倾错误。

这次“左”倾错误虽是晋绥局部地区，但其做法和恶果是很严重的。晋绥党的“左”倾错误，从指导思想上来说，是康生、陈伯达直接指挥的，李井泉同志是晋绥分局的书记，直接地执行了康生、陈伯达那一套“左”的东西。

土改的准备工作一开始，李井泉同志提出：晋绥党过去（指林枫同志担任书记的时期）的成绩很少，错误很多，特别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所以，要领导各级党开展反右倾运动，作为开展土改的准备工作。他搞了三次大的批判会：第一次召开晋绥民兵会议批判右倾。当时的民兵工作归卫一清同志负责；第二个批判会是批判晋绥的贸易工作右倾。当时晋绥的贸易工作和银行工作是我主管的，参加批判会的有晋绥党、政、军干部，各县的贸易工作干部，还有在党校学习的全体学员。会议规模很大，不少人发表了批判右倾的意见，我在大会上作了三次检讨。最后，李井泉同志的结论说：晋绥的各项工作有好有坏，而贸易、银行工作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就是说，晋绥贸易工作的成绩被全盘否定了。他否定的理由是，根据地的贸易和银行是公家办的，不应该和私人工商业有往来，不应该使私人工商业发展。将来我们要办商业经济，那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不是发展私人工商业。我领导的贸易总局和银行总行同私人工商业有往来，还发展了私人工商业，这是右倾错误。同时也批判了贸易工作“浪费惊人”。举了一个例子是，发现临县贸易局的盐堆上有一堆狗屎，以此就给贸易局干部带上了一顶“浪费惊人”的帽子。应该说，贸易工作上是有缺陷或者错误的，但不能根据这么一个例子，就说全部贸易工作“浪费惊人”，这个话是夸大了。根据这样一个结论，紧接着就改组了贸易总局，把

我送到晋绥党校学习去了。在李井泉同志的指导下，就把晋绥的私人工商业全部没收了。私人工商业被没收之后，晋绥经济萧条，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损失；第三个批判会，就是批判晋绥过去党的领导人。具体地说，就是批判林枫、张稼夫等领导同志。当时林枫同志已到东北，不在晋绥，是缺席受批判的。张稼夫同志在晋绥，他是面对面的受批判。批判之后，就把他调到临汾县担任县委书记，一下子由晋绥分局党的副书记贬为县委书记。李井泉同志在干部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林枫、张稼夫这些人是学生娃娃，根本不懂得革命。所以，他们对晋绥工作的领导是右倾的，是没有成绩的。”李井泉同志把林枫、张稼夫同志领导的工作成绩全部抹杀了。

到一九四七年土改进行中，有一个有名的“郝家坡试点”，是康生掌握的。还有一个“木兰杆试点”，是陈伯达搞的。这两个试点提出了许多错误的意见。譬如说，划阶级成分，他们说，不能按毛主席写的《怎样划分阶级成分》的意见来划。康生他们自己搞了三条：第一是，看这个人的政治态度。根据这个人的政治表现，定这个人的成份；第二条是查三代。本人即使不是地主、富农，但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是地主富农，他就被定为地主、富农。这样就把当时的一些贫雇农、中农往上排三代也定为地主、富农了，结果挨了批判，有的人扫地出门；第三条标准是，看铺的摊摊大小，不是看有没有剥削。即使没有剥削，但铺的摊摊大，也按地主、富农对待。这样一来，就把许多真正的贫雇农和中农当作地主、富农批判了、斗争了。有的扫地出门，伤害了很多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的表现。

再一方面的表现是“搬石头。”他们认为，过去的晋绥各级党都是错误的，党支部都不能用了，过去的干部也不能用了，另外挑选他们认为可用的人来领导土改运动。这样，就把过去的干部与党员，特别是基层的干部与党员全部打击了，而且发动了一些群众搞斗争。这些群众中有流氓、地痞参加，把区乡干部打死很多。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县，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皮，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听说，这个区长过去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人民非常热爱，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活活刮死了。党校有好多人认识这个区长，非常尊敬他，看到这一惨景，党校的同志无不痛哭流涕。

第三个表现，就是把各级党委特别是基层党支部都作废了。晋绥分局的书记就留李井泉同志本人，副书记张稼夫同志被批判后下放到县里去了，其他的干部也是被批判。地、县委好多人靠边站，区、乡一级的党员好多被打死。这就是说，原来的整个晋绥党，除李井泉同志以及跟随他的少数人如周文、武新宇等同志之外，都是坏的，都不要了。土改中，晋绥地区出了一个全国很有名的布告叫《告农民书》，其中提出：“群众要咋办就咋办”，根本不要党的领导了。这个布告流毒很广，在全国各根据地工作的许多老同志都知道晋绥的这个“告农民书”的“发明”。

由于土改中的错误，加以对没收地、富的粮食保管得不好，被浪费了，大批群众受饥饿，死亡的人不计其数，逃荒都来不及，每天在党政军机关门口堆了好几十个群众要饭吃，说：“你们要吃饭，我们也要吃饭”。到开饭时，机关

干部偷着吃。广大群众的情绪低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基层干部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没逃走的好多干部都躺倒不干了。土改分得地主、富农的一部分粮食没有人管理，群众里头有一些地痞流氓就自己动手大吃大喝浪费了。等到第二年春耕的时候，人没有吃的，种地没有种籽。

后来，毛主席发现了晋绥的这些“左”倾错误作法，对李井泉同志发了很大脾气。毛主席说：“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你李井泉同志不和我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咱们俩个，我在陕甘宁，你在晋绥，一河之隔，为什么就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希特勒与斯大林还互通情报嘛！为什么，你就不和我通通情报。”毛主席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怎么去战胜敌人呢？应该军民联合战胜敌人，发展生产，发展解放战争的力量嘛！私人工商业是要发展的，你们回去立即纠正，把没收了的私人工商业，全部退赔，赔礼道歉，把私人工商业的资金退还人家，把私人工商业扶植起来。”毛主席针对晋绥这种错误，着重地写了文章。在《毛选》里有三篇文章讲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用鼓励的口气批评了晋绥党。毛主席说，“晋绥党纠正了错误是好的。”毛主席还指示说，“现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工作开展了，大批的晋绥干部要南下，要叫李井泉同志把晋绥的老百姓救活了，经济生活走上了轨道之后，才能南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晋绥分局派了许多工作组下乡去开展“救死救荒”的恢复工作。我从党校回来后，准备到晋中去工作（担任晋中行署主任），李井泉同志要我参加一段“救死救荒”工作。李井泉同志对我说：“我们犯了错误，毛主席批评了我。”我在去晋中以前，晋绥分

局要我参加兴县高家村的“救死救荒”工作组。工作组下去后，晋绥分局规定了一个办法：看谁的腿肿到发黑的程度时，每天发给他二两粮食，不到这个程度的人，不给发粮食（因为没有这么多粮食）。实际上一个人的腿肿到发黑的程度，发给二两粮食也救不了他的命，更谈不到下地生产。这说明晋绥党委犯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毛主席的指示是正确的。在李井泉同志的错误中，有康生、陈伯达的指挥起作用。虽然晋绥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了纠正，实际上纠正的已经晚了。

我在晋绥土改运动中，受到很大的冲击。首先是在土改的准备阶段，如前所述，由李井泉同志主持，批判我们的贸易路线右倾。事先，由贺龙同志派甘泗淇同志带了一个工作组到贸易总局进行检查，检查后先向贺龙、李井泉汇报。汇报之后，召开了批判大会，地址在兴县蔡家崖村的大窑洞里。当时，在大会上有个争论的问题，有人说贸易局赔了钱，我说：如果按白洋折算，我们是赔了钱的，当时晋西北的钞票不值钱。但是如果按小米来折算，我们是赚了钱的。甘泗淇问：你的小米在哪里放着，拿来我看？我说：“晋西北的各县贸易局都有东西放着。”最后，李井泉在大会上作的结论是：“晋西北贸易工作没干一件好事。”在批判大会上，提出扶助私人工商业问题，说这是右倾错误。我说这是在延安时，陈云同志提出的意见。李井泉说：“陈云那一套不行，不对。”批判以后，当时王磊在汾阳县收购棉花，临时紧急命令，调他回兴县贸易总局接替我的工作，并派公安总局副局长李富山到贸易总局扣押了李益同志。据马孔智（六分区专员）说：分局已内定要把牛荫冠打成经济反革

命。后因查无实据，未成事实。于是，就把牛荫冠的贸易总局局长职务撤销了，取消了警卫员，送到晋绥党校去。晋绥党校在兴县张家圪垛时期，由李井泉直接领导，把兴县蔡家崖村的土改，作为李井泉直接掌握的重点，开了一次很大的“斗牛大会”，全县的农民代表都参加了会议，晋绥领导干部，党校全体学员也参加了。斗争的对象是牛友兰。斗争大会上事先通知牛荫冠当众宣布和牛友兰脱离父子关系。李井泉还大声说：“牛荫冠，你要站在贫下中农方面与你父亲斗争。”领导小组组长还告牛荫冠在斗争大会上动手打牛友兰。大会开始以后，发动群众用火铍烫牛友兰的身体。并叫牛荫冠拉住牛友兰的鼻孔上串的铁丝绳子游街。斗争大会不久，牛友兰就死在被关押的地方。同时，在黑峪口斗争了开明士绅、秘密共产党员刘少白同志。党校到宁武是大家背上行李步行去的，在宁武背炭、背粮、种地渡过春荒年景的日子。在斗争牛荫冠的同时，斗争了牛荫冠的爱人赵辉，给她戴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说她替地主牛友兰保存了金子，使她日夜不息地受批判，连两个小孩生活都无法照顾。当时，赵辉是晋西北妇联的领导人之一，批斗之后，经李井泉的大笔一挥，把赵辉的妇联领导人（晋绥分局妇委委员）的名字勾掉了。我在晋绥党校住了一年，后来调回分局，由龚逢春同志主持解决我的问题。龚逢春同志对我说：党中央调你到华北地区工作，新成立了华北地区的晋中区，要你担任晋中行署主任。晋中区党委书记是罗贵波，副书记是解学恭，他俩已经先去了。军区司令员是罗贵波兼。行署副主任是史怀璧，是从晋冀鲁豫调去的。要给我作个鉴定，龚逢春主持，叫我先写。后来，李井泉看了我写的那个鉴定稿很不满意，

他自己动手在上面修改了很多地方，几乎等于李井泉全文重写了一遍。李给龚逢春写了一个信，在信中，李井泉说：

“如果照牛荫冠自己这么写，不是说明我们晋绥党领导上就输了理了吗？”信中还说要我按照李井泉修改的内容全文照抄。否则，不作结论，不许我离开晋绥。接着，李井泉请了一次客，是欢送我到晋中区的，也欢送孙志远（是一二〇师独二旅的政委，二旅旅长是彭绍辉），孙要去打太原。宴会前，我与李井泉个别谈了一次话，我说：“我的鉴定，已照你修改的内容，全文照抄了。上边对于浪费惊人与扶助私人工商业都没有提，为什么又加了句作风不够正派，这是指什么事而说的？”李井泉说：“那只是一种精神，一个人不能一点错也没有。你的作风问题，这句话可以改，可以不写上，但以后再改吧。”我也没有追到底，就算了。我当时的心情是，不管他怎么说，只要能尽快离开晋绥就行了。这时，李井泉又说：“你调到晋中地区担任行署主任，希望你去了以后派公粮与派民工的时候，照顾到我们晋西北的困难。”意思就是叫我少派一点。李井泉还说：“我犯了错误，毛主席有批评。现在干部都南下，毛主席不叫我现在南下，叫我先把晋西北人民的生活与生产搞上轨道，才能南下。”

我于一九四八年秋来到了晋中地区。当时临时划了太原周围的十几个县，建立了晋中地区，成立了晋中行署。行署下属三个专署（即区党委领导有三个地委）。主要的任务是筹粮、筹草、派民工、搞担架，支援徐向前为司令员的十八兵团，围攻阎锡山占领的太原城，做了不少工作。同时我还兼任了十八兵团领导的支前司令部的政委（司令员为裴丽生）晋中地区归华北局领导。我去过华北局一次，汇报工作。华

北局书记薄一波、副书记刘澜涛对我讲：“晋绥对你的批判是错误的，但是，请你不要计较此事。”后来太原一直解放不了，于是就调我南下到江西省作财经工作。江西省财委的主任是省委第一书记兼，我任副主任兼财政厅长。

一九八四年三月

兴县党史办供稿